

论 1941—1948 年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

单立阳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要: 1941—1948 年间, “边政学”兴起, 民国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的宗旨展开了广泛讨论。时人普遍认同边疆教育应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根基, 并承认其特殊性, 主张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推动融合。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教育提高边疆民众的文化水准和国家认同, 形成可动员的国防力量, 并以此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然而, 这种统一导向常带有汉族中心主义色彩, 导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倾向。部分学者反思应在差异中求统一, 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这一思想交锋折射出民国时期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多元与一体之间的深层张力。

关键词: 边疆教育宗旨; 抗战建国; 中华民族

基金项目: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资助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国边政学研究” (ZL-C251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0

近代以来, 边疆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核心词汇。在民国后期 (1941-1948 年) 兴起的“边政学”中, 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围绕“边疆”的各个方面展开了充分而又极具现实感的讨论, 其中对“边疆教育”展开的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一隅, 而是将其视为“对内有关乎文化之交融、民族之团结, 对外有关乎国防之建设、国际关系之调协”^{[1]10} 的重要工作, “并非仅限于学校门墙以内之教育, 而是社会改造之教育”^{[1]62}。当前学界对这一时期边疆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涉及到边疆教育政策之演变、边疆教育实践个案、边疆教育代表人物等, 而对边疆教宗旨的探讨却未见深入, 仅有杨思机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分析了宗旨之演化, 故本文在前人基础上, 探寻这一时期民国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认识, 以期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杂生成历史的认识。

一、何为“边疆教育宗旨”: 普遍、特殊与过渡

民国知识分子在围绕“边疆教育”展开讨论时, 都需要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 即在边疆和内地“相去悬殊”的前提下, 如何确立其教育宗旨。是时, 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从事边疆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内地教育有很大不同, 如西尊所言: “我国边疆, 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惜因地处边陲, 交通不便, 且民族复杂, 语言各殊, 人民生活简陋, 笃守宗教, 与外界极少往来, 且历受政治经济之阻力, 以致教育文化一落千丈”^{[1]43}, 吴鼎也指出“边疆以地处边陲, 民族互□, 语言文字均与内地不同, 教育之推进, 确较内地为困难”^{[2]63}。

但是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并不建立在这种特殊性之上, 而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个民族的文化”^{[1]93} 这一基础之上。也就是说, 边疆教育只能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教育之成分进行讨论, 其宗旨也自然与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保持一致。1929 年,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中华

作者简介: 单立阳 (1998—), 男, 汉族, 江苏徐州人,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通讯作者: 单立阳

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利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族发展以促进世界于大同。”^{[3]100-101}1931年教育部制定颁布的《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也将“依遵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4]830}列为边疆教育的首要目标。王裕凯认为“站在中国民族立场，论民族教育，当然要根据三民主义与政府所颁布的教育宗旨。”^{[5]42}徐益棠在《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一文中强调“故边疆教育之普通的原则，只有一个，此即中央政府所厘定之‘教育宗旨’是也。凡我胞民，均无例外，边民同种，亦须准此。”^{[1]106}曾紫绶在引用了大段清末姚锡光关于“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蒙汉同化之一法”的论述后，指出“今日之情况，尚与昔年无别”，并进一步主张“夫国家办理边疆教育，既与内地同视，则内地国民教育国族教育之宗旨，亦应适用于边疆，俾有所循，以趋正轨，其不适者，应纠正之，否则边疆教育愈发展，则种族之裂痕愈深，于国家边民，均无益也。”^{[1]155-156}刘曼卿也主张“边疆教育要求改进，也必须要‘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以期民族独立，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的教育宗旨去做为改进的根据。”^{[6]143}

在强调边疆教育宗旨与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具有一致性的同时，众多知识分子也认识到边疆教育的特殊性，一是强调其与内地教育的不同，然这种不同主要建立在边疆与内地之不同环境的基础上，并非从边疆教育自身属性出发进行的阐发，如刘守宜指出“少数民族教育和非少数民族教育的分别，好像是多余的。可是，边地环境特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和内地相差很远，又不可不作特别的措施。忽略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等于抹煞少数民族的独立人格。我们并不存心冒犯，别具用心的罪名。然而客观的事实并不允许我们把少数民族教育和普通教育混为一谈。”^{[7]85}二则从“边疆教育”的内在属性出发进行的阐释，如朱家骅。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首先是将“边疆教育”中的“边疆”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边疆教育与一般教育之区别。他指出“文化的边疆，为教育的对象”，而“文化的边疆，系指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而言”，具体包括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高山族等“使用特殊之语文”之族群集中的地域。^{[1]2-3}朱家骅强调，“边疆教育……与常轨的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系一种文化的传授、改进与创造，其文化内容为一元的。边疆教育除保存及传授各族之固有文化或地域文化之外，并须灌输民族国家所需的统一文化与现代文化，其文化的内容为二元的，如何使二元文化同时传授而不相冲突，如何使二元文化趋于一元而创造国族文化之最高型式，则应确守下述两大原则——谋适应，求交融。”^{[1]3-4}也就是说，“边疆教育”的特殊性绝不仅仅在于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学师资、教学方式等操作层面，更重要地是在于边疆教育面临的对象是一种异域文化，需要解决将这种异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起来的问题，亦即朱家骅所说的“从以异为起点，以求同为终点。求同，非任何一个民族之个别目的，而为整个国族一致之要求”^{[1]4}。凌纯生也强调，边疆教育和普通教育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使“边疆文化国族化”，“对边疆民族予以国家教育，使边民接受现代的文化，同时又能保存其固有的文化”^{[8]62}。

在此基础上，朱家骅还提出了边疆教育的过渡性问题。在《论边疆教育》的结尾，他提出“边疆教育又为不断推进之过程，终极目的，在巩固地理的边疆，改进政治的边疆，融合文化的边疆。目的达成，能事已尽，三十年后，中国将不复有边教之设施乎？”^{[1]11}时任贵州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也对边疆教育的过渡性有所阐发，他在《边疆教育之今后》一文中畅想道：“边疆教育是适应时代与环境需要而兴起的过渡的教育设施。我们希望经过短时期的努力以后，全国国民个个都受同样的教育，整个国家文化水准全面的升高、使得今日努力倡导的边疆教育成为教育史上的一页，边疆教育一词成为过去的名词。”^{[1]178}

二、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内涵认知

在认定“边疆教育宗旨”是“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在边疆地区的具体展开后，民国知识分子围绕着宗旨的具体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杨思机指出“‘边疆教育’作为新的教育类型，承担教育普及和民族融合两重使命”

^[9]¹⁴²，并以时间为序梳理了“民族融合”这一宗旨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流变，但是并未进一步展开对宗旨的系统讨论。通过细致解读边疆教育相关文本，会发现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认识始终围绕着“抗战建国”四个字予以展开。具体而言，“抗战”层面，或者说“国防”层面，即以边疆教育加强国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建国”层面即以边疆教育融合多元民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立现代国家。同时人所普遍认同的“抗战与建国并行”一致，知识分子并未将边疆教育的宗旨完全割裂开来，同时对其宗旨的相关讨论中大多隐含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文明等级论色彩。

（一）“国防”视角下的边疆教育宗旨

早在“九一八”之前，知识分子就提出了发展边疆教育以巩固国防事业。萧剑秋曾提出“筹边十六策”，将教育视为“万事之祖”，“是故文字不同，学之必能贯彻；言语各别，学之亦渐相通，推而极之，大可罗万有而贯三才，小亦可变性情而改气质。”^[10]⁴⁶“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既嗾南疆独立，又助藏军内犯，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11]¹。可以说，每个边疆地区都面临民族问题和国防问题，同时两大问题又通过若干环节紧密联系，教育在其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于边疆教育如何与国防产生联系，知识分子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路径：一是认为教育乃边疆问题的重要一环，边疆问题是国防问题的核心甚至等同于国防问题；二是引入“精神国防”一词作为二者的连接点。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国防”宗旨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抗日。卫惠林在《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一书中分析了边疆问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我们整个边疆皆破碎零落，包含着内政上之弱点与国际间的纠纷，且其住在各民族多未能与内地人民精诚团结。此种事实关系于此次对日抗战之成败，极为明显。”^[12]²³接着，卫氏指出“欲解决此等边疆问题，完成团结御侮之神圣使命，有两个根本的途径，即普遍的推行民族教育和彻底刷新边疆政治，此二者有密切之关联，惟边疆政治之刷新，必须借民族教育之推行为其前导，为其依据，因为边疆政治制度容有种种障碍不易一时革除者，但民族教育则有以民族战争的神圣要求下迅速推行。”^[12]²⁴王一影在对“边民教育巡回施教”进行解读时，强调巡回施教应“以激发边民抗战情绪，提高边民文化水准，养成边民拥护政府服从领袖的概念，暨宣扬总理的遗教及阐扬抗战建国国策为宗旨”^[1]¹³⁰，并提出了10条边民教育巡回施教之要点，其中6条直接关涉“抗战建国”。亦有人大倡“若欲挽救危亡，抵抗强暴，首须巩固边疆，致力于经济之建设，政治之革新，交通之开辟，而尤应注重于教育之发展。教育之效力，虽不若经济政治方面之显著迅速，然而唤起边疆民族奋发图存之精神，实为巩固边疆之基本工作也。”^[13]担任重庆职业学校校长的陆叔昂撰文讨论西南边疆的教育问题时也指出“为求抗战胜利，急宜建设西南，为谋复兴中华民族，更宜建设西南。……教育为建设一切的基本工作，离开教育，就谈不到建设。”^[14]³²

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精神国防”作为连接起边疆教育与国防的桥梁。所谓“精神国防”乃国民政府在精神文化领域所做的抗战宣传，试图提升国人自信心和精神力量以抵御外侮。既然是引导民众抗战精神之发展，因而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黄熙庚主张“边疆教育须以建国信仰为施教中心……对于边疆数千万同胞，无论其精神与物质的生活，均应提高其标准和内地各省一样，所以培养其爱国思想与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使其了解国民应尽之责任，俾能贡献其所有人力物力，共同从事于建国大业，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与国防最前线的任务。”^[1]¹¹⁵刘刚甫提出“对于边地一切事业，欲使之向上发展，而对于边民教育，更不能不设法亟为实施推进，俾得达到精神国防之完成”，“欲建设国防，对于边民教育，实不可忽视之要件”^[15]⁶¹。西尊提出“边疆教育亦应依据抗战纲领为基本教育方针……应注意国民道德之陶冶，民族意识之促进以坚定其抗战之决心，使我全国朝野团结，致在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领导之下共赴抗战之重责。”^[1]⁵⁶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任职的骆美奂也强调“边疆教育知识建设边疆工作当中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边疆建设，就是国防建设，而国防建设，不

外乎国防的精神建设，和国防的物质建设两种。两种工作，都需要边疆教育来担负重要的部分，完成主要的使命”^[16]。张廷休提出“内边的边疆教育，首在建立国防的‘精神堡垒’。国无边则亡，故救国必先救边，春秋大义，厥在严夷夏之防，中国数千年来兴废继绝，端赖此义不泯。”^[17]^[102]萧文哲系统论述了边疆民族与精神国防之间的关系，指出“今日中日的战争，不仅是政府与政府战，而且是民族与民族战。在这样大的战争中，更要使每个国民振奋精神……从自私自利的怕死心理，改造为救国救民的勇敢心理，造成全国国民皆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下，集中意志，团结力量。……尤其是于动员内地民族的国民精神外，更要动员边疆民族的精神，造成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普遍发展”^[17]^[61]。

抗战结束后，然建国任务更巨，时人所言“应知建国的工作，比抗战艰难百倍，务宜集中力量，以求建国事业的开展”^[18]。因而边疆教育绝不因抗战结束而结束，相关人士在讨论中也多对边疆教育之于国防的重要意义有进一步强调。高长柱指出“不善筹边，致使边亡，无边亡国者，即边亡而国防失，国防失则国随之亡矣。是筹边与国防，关系至为密切，故谓筹边即建设国防，无不可也。”^[19]^[4]而无论如何筹边，都“必先启迪其民识，推进其文化，改良其政治，增益其建设与生产，务要边疆与中原有同等之发展”^[19]^[3]。《华北日报》曾发表社论强调发展边疆教育“不但国力将因而增强，即国防亦可借此巩固，真正强大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就奠基于此”^[20]。曾广铭分析宁属及雷马屏峨边民教育时承认“边教与边防之关系尤为密切”，并进一步分析了边民教育如何在巩固国防方面的功用，不外乎以边教推进民族团结，将边民打造为“国家的干城，国防的生力军”。^[21]^[1-2]姚蒸民在分析新疆问题时也强调其国防意义，强化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治理和新疆地区的国防，必须要促进其“现代化”与“中国化”，其中之关键就在于以教育普及推动“边疆内地化”：“要知边疆较内地为落后，非使‘边疆内地化’，实无法防止外人之侵略，而边疆内地化之主要动力，乃在于教育之普及。”^[22]

总之，无论是战前、战中和战后，知识分子关注边疆教育绝非停留在教育层面，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提升边疆民众的文化素养，增强国家认同感，进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能够为中央政府所使用的国防力量。

（二）“建国”视角下的边疆教育宗旨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很快放弃了以“汉地十八省”为范围的“小中国”的想法，转向了立宪派提出的“五族共和”说。随着边疆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五族共和”逐渐为“中华民族”取代。尽管在对“中华民族”一词进行概念的、历史的的解读时，不同学者往往意见不一。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在试图以边疆教育确立“中华民族”的政治属性，使中华民族理论“负担起民族主义时代论证‘大一统’正当性的重任”^[23]^[104]，如徐益棠所言“我辈治边疆教育者，当努力设法消灭各民族隔阂之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1]^[110-111]

边疆教育之所以能够推动现代国家之建设，主要在于其两大功用，一是提升民智进而涉及国家建设发展之各个层面。如朱家骅所言，“边疆教育……终极目的，在巩固地理的边疆，改进政治的边疆，融合文化的边疆”^[1]^[11]。众多知识分子在讨论中也多将边疆教育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相联系。梁瓯第提出，“作为治边方略之一环的军事、政治、经济。必须和教育连系起来，同时并进，兼容并包才能收事功之效。”^[1]^[18]孔祥熙更是在边疆教育会议上提出“边疆建设必须以文化教育的心理建设为起点”，“必须加强教育的实施，启导民智，发扬民德，然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心理建设，才能够成功”^[24]。又如抗战结束后，曹树勋指出的“边疆教育为边疆建设之一环，边疆同胞自治能力之培养，经济生活之改善，文化水准之提高，必以其人民具备足够之知识为前提，是必先借手于教育，故边疆教育，尤为边疆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之一环”^[25]^[1]。郭有守亦指出“改善边民生活，提高文化水准，培养边民国家民族至上之观念，使于中华民族有极强之意志，于政府有极坚信之信仰，进而促进政治经济之发展，充分发挥边民治人力与物力，以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效……胥

教育是赖矣。”^[26]

二是有助于“一个民族”之建设。是时，知识分子普遍乐观地相信边疆教育的发展无疑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王一影认为“实施边民教育，是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基本事业，并且是促进中华民族内各部族文化之统一及文化水准之提高的唯一方法”^[1]¹⁴³。高长柱强调实施积极主动的边民教育，“则种族虽各有不同，感情必终趋一致，以历久之无猜，自一道以同化，无免离德离心之患，而有同文同轨之盛。”^[19]⁴

如何以边疆教育将众多语言习俗各异的民族如何融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主要给出了两种选择方式，一是进行同化教育，二是融各家之长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就同化教育而言，它与所谓的“同源论”“中华民族宗族论”有着密切关系。“同源论”的出现是学界政界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兴起的理论，“宗族论”可谓其极端形式。这个相当违背历史事实且无逻辑的理论不仅有国民政府的背书，而且也俘获了一批知识分子“如罗家伦的《新民族观》、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等民族学与民族史著作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释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观，甚至在非汉人士中，很多人也公开认同并阐发这一观点”^[27]¹⁸³。黄熙庚在阐释发展边疆教育以扶植边民自治之目标时，提出“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在最初即见一混合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是有其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统，共同创造的文化；汉人和边民的差异，也只是文化程度的不同。”^[1]¹¹⁶曾任贵州大学校长的回族知识分子张廷休也对所谓“同源说”深表认同，更是直接提出了“中国没有少数民族问题”，认为“汉族的汉，只是一个朝代的代称……现在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习惯的……今所谓夷苗等人，自然是构成整个汉民族的极重要的分子，他们与汉族的关系最为密切，溯其源流可说是同一的民族”^[1]⁷⁶⁻⁷⁷。

不可否认，所谓“同源论”“宗族论”是政府和民间“面对国族沦亡的危局……有意跳脱‘民族之下有民族’这种在逻辑上难圆其说、在政治上自我设限的窠臼；借由否认包括汉族在内各族群的‘民族’身份，塑造有益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整体身份”^[27]¹⁸³的基本方式，但是如此一来必然地会使得原本力求提升少数民族现代化水平的边疆教育陷入到“同化论”之中，如西尊提出“应尽量推动同化工作。边疆文化落后，兴办教育不但课程内容予以改进以适合抗战及边疆之需要，而于生活习惯暨不良风俗亦应在施教时设法运用，使之同化，尤其苗夷及其他蒙回藏等族尤为急需”^[1]⁵⁷。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直接提出了要将少数民族“汉化”的主张，如王一影提出“边民的文化水准很低，夷兵的见识很浅，思想单纯，秉性刚直，动作野蛮，我们要做施教工作……切实推行新生活运动，转移风气，达到‘夷兵国军化，夷人汉化’的目的。”^[1]¹⁴²由抗战后从政的人类学者陈国钧起草的贵州地区边教实施方案更是直接提出“就地筹款逐年增设苗夷小学校普及至全省各苗夷居住县份，以达到完全同化于汉族，是即苗夷教育完成时期。”^[1]²³⁸

当然，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认同“同化教育”，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自不例外，即便是倾向国民党甚至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也有相当一部分坚持在边疆教育中尊重少数民族的独立性，否定了“同化”或“汉化”说，提出融各家之长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其中尤以梁漱溟的论述最为系统。在《边疆教育导论》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边疆人民内地人民不是殖民者群与原住者群的对立，而是一种兄弟般的友爱关系”，因而绝对不应该将同化视为实施边疆教育的前提，并指出“人为的同化……不外是殖民政策之一种……以削足适履的手段，强人所难，决非我国实施边疆教育的基本方略。”^[1]²⁻²¹在分析贵州苗民教育时，他又提出边民教育应该坚持“同异并施”和“同中有异”，即坚持教育宗旨上的“绝对的一元性”，“边疆教育的实施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方针，依照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则，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28]⁵⁹。

陈定国认为中国境内存在着多元文化模式，而边疆民族文化固然有些落后，但是其中蕴含了一定的能量，“我们似乎可以再来一次中国民族文化内的大交流。以往中国内地人总因为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总抱着一种优越的

感觉，以为我们是开化最初的，这个大大的错误，遂形成中国文化走上尽头，今后我们首先应摆掉这偏见，努力吸收边疆文化，尤其要吸收边疆文化的精神，告诉你，我们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值得夸耀的，只有来一次大综合，再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否则只有一任其凋谢下去。”^[29]曹树勋提出“利用教育的力量，改进各宗族之文化、并撷取各种族文化之精华，汇总为中华民族文化，以达文化统整国族融合之境地。”^[30]⁸⁸⁻⁸⁹卫惠林则进一步提出了“统一与同化政策必须修正”的口号，认为“对文化政策应一方面不伤害其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交流，以促成其现代化”^[31]¹¹。

三、边疆教育宗旨与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历史交汇

民国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的思考绝非是一种空想。一方面，他们提出诸多建议试图影响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的边疆教育政策，另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努力在边疆地区践行其教育理念，将边疆教育宗旨从文字转化为现实。对这群投身于边疆研究和边疆教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边疆教育绝非仅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化制度安排，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政治工程。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不仅反映了边疆教育本身的复杂性，也充分揭示出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困境。

（一）追求统一和同一：边疆教育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王珂在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行分析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是从国家到民族，即按照国家的规模形成民族；而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则是从民族到国家，即按照民族的规模形成国家。”^[32]²¹⁵相较于传统中国的夷夏之防，在面对已经在中国大地出现近百年的内忧外患交织、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国家领土不断被外力侵犯与蚕食的局势，民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力图使“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国公民的共同身份认同，进而形成一股合力以“认中国为其唯一之国家，而不为帝国主义者之谗言所动。”^[33]

胡耐安在对边疆教育问题进行分析时，就特别强调了“一”，他指出：“我中华民国为一整个中华民国，其居处于中华民国国土以内之各民族，早已凝结成为一整个之中华民族。……医病医愚，为今日边疆教育之先务。病愈愚治，渐次而及其贫其私，夫然后我中华民族之基础，于以定矣。”^[34]²³因此，边疆教育之核心就在于塑造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同一，维护中华民国之统一，亦即1939年全国教育会通过之《推进边疆教育方案》中提出的“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35]¹³¹前文提及，朱家骅提出边疆教育“从以异为起点，以求同为终点”，“使二元文化趋于一元而创造国族文化之最高型式”，表明了他对以边疆教育推动民族同一和国家统一的充分自信。在朱家骅这里，各民族文化均有其长处和缺点，“吾人对于国内各族文化之交融，首要在弃其糟粕，撷其精华，将各族文化之优长部分，融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则百川朝海，必能蔚为大观。”^[1]⁵时人对这一观点也多有认同，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在研究西南民族时就提出“欲言民族之融化，当供其与内地汉人，加速融化，期以汇合各族文化之精华，构成一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新文化”^[36]。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过程，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机制，并由此培养出坚定信仰三民主义、忠诚于国家政权与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国民。

（二）去差异化：边疆教育中的汉族中心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

从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时人对统一国家之渴望。然而，在传统大汉族主义思维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情况下，对“一”的强调极容易滑向对多元的否定和对汉化的认同，即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去差异化”。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在论述边疆教育时已经有了极为明显的“汉化”思维，倾向于借助消除民族差异，甚至是抹煞少数民族的独立性，以“宗族”取而代之以实现团结的目标。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观念之下，否定多

元民族和“民族自决论”自然也就登上台前。《东南日报》发表文章将承认多元民族视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否定中华民族的存在，肯定汉、满、蒙、回、藏、苗等‘族’的存在，是敌人一贯的分化阴谋，它利用了‘民族自决’这一美名，煽动各‘族’独立建国，以便将中国割为若干日本的傀儡国。”“我们要否定中华民族之外，还有所谓汉、满、蒙、回、藏、苗等‘族’的存在！”^[37]

在此宗旨和目标的指导下，当时提出的诸多边疆教育方案无疑也会充斥“大汉族主义”色彩，如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提出“边地学校上课时期，教师授课应随通例，一律操国语，教师之不能操国语者，分别抽训或调免。……凡学生国文国语成绩不及格者，纵令他科优越，亦不得升级，学校并须利用寒暑假，设法予以特殊之补习机会”以及禁止使用苗文等^{[38][64]}；又或以“现代性”“进步”为名，干预乃至否定当地民族原有的文化实践，简单地将边疆民族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将宗教信仰贬之为迷信，甚至要求改穿汉装。如陈清宁笔下的瑶族“一方面是愚昧无知，一方面是遭受贫困死亡的威胁，而且一贯的保持着对异族的仇视，对政府的冷漠与厌恶的心理”^[39]；黄熙庚认为所有少数民族是“迷信深笃，风俗怪异，欲望低弱，精神萎顿”“对于社会的认识，只知有宗教而不知有国家，迷信宗教，既深且笃。一切风俗习惯悉受支配、无论精神物质生活皆为熏陶，形成少欲知足的人生观，习于固陋，排除外来文化，安于旷野，鄙弃现代科学。”^{[1][17-118]}

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状态下，此种行径固然可被赋予现代化和国家安全的正当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压制与边缘化，进而引发边疆民族在文化认同上的反弹，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隐忧。

（三）控制与冲突：边疆教育中的政府权力与地方间冲突

边疆教育是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机制，它试图借助国家意志的名义控制地方社会并对其进行知识、制度与价值观的重塑。然而，边疆地区所具有的强烈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复杂的族群结构，使得国家教育项目很难“原封不动”地复制内地经验。这种现实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如何在保证国家至上的前提下，提升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的适应性。

正如前文指出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在坚持国家统一教育宗旨的基础上，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习俗与文化，努力实现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三民主义教育原则的在地化。在国民政府的官方教育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要在国家统一的教育宗旨之下尊重边疆民族的习惯风俗等，不应照搬内地的标准。然而在具体操作中依然会出现冲突，最典型便是“政府官员没有协调好国语、国文教育与民族语言文字教育之间的关系”^{[40][43]}，强迫边疆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和汉字，“不仅在生活上无实际的需要，并且反面对生活上有妨碍”^{[41][98]}。周辉福亦检讨称“边地青年如果强迫其读国文，习国语，均以学习困难而视为畏途，甚或根本不愿入学，反致阻碍正常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不过是教育的工具，并非教育的目的，故权衡轻重，斟酌得宜，对国语教育之推行，实无强迫的必要，至少在国民教育阶段中，应不必强迫学习，可任边生自由选择。”^{[38][208]}

不论这种尊重是手段性质还是目的性质，至少是提出了“尊重”。这也就意味着，建基于这样一种边疆教育宗旨之上的边疆教育目标，就不再是借助国家权力控制地方，抹平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实现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间的共存，进而实现全体国民在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统一。因而，边疆教育不再是单向度的国家教化，而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制度性空间。

这种立场实际上接近于现代国家理念中“多元一体”的治理原则，即国家既要在制度与政治上实现统一，也必须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理念尽管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却为后世民族政策的反思与修正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四、结论

边疆教育宗旨的确立和内涵建设，是民国知识分子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努力。回望1941-1948年间针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眼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及在民族国家构建统一认同过程中发生的思想碰撞。这一过程既充满着理性的政治设计，也飘荡着文化霸权的幽灵。在当时国家尚未完全独立、疆域尚未完全整合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通过讨论已经规定好的“教育宗旨”试图填补国家认同的空白，实现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的过渡。

民国时期围绕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既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注脚，也是一个持续问题的起点。它不仅为今日民族政策与教育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在不断提醒着“民族国家”框架下多元与一体之关系的复杂性。直至今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新形势下，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文化多样性与国家认同的共建，并为世界处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提供给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

参考文献：

- [1]汪洪亮.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10.
- [2]吴鼎.边疆教育之现状及今后推进方法[J].边政公论,1941,01(09).
-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1、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5]王裕凯.教育论丛[M].贵阳:熙明印书馆,1944.
- [6]刘曼卿.边疆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7]刘守宜.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D].武汉:国立武汉大学,1940.
- [8]凌纯生.中国边疆文化（下）[J].边政公论,1942,01(11/12).
- [9]杨思机.从“五族共和化”到“中华民族化”:民国时期“边疆教育”的民族交融宗旨解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5).
- [10]萧剑秋.筹边纪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 [11]凌纯生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M].南京:中正书局,1939.
- [12]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M].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
- [13]实施边疆教育计划两要点[N].东南日报,1935-08-08(02).
- [14]陆叔昂.西南新建设中的教育问题[J].西南导报,1938,01(01).
- [15]刘刚甫.救亡与筹边[M].汉口:光明印刷商店,1938.
- [16]边疆教育与国防[N].时事新报,1944-01-19(2).
- [17]萧文哲.边疆民族与国民精神总动员[J].精神动员,1940,02.
- [18]李国俊.以开国的革命精神扫除建国的障碍——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暨三十五周年元旦而作[N].中山日报,1946-01-01(11).
- [19]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M].南京:中正书局,1948.
- [20]发展边疆教育的重要[N].华北日报,1946-10-28(2).
- [21]曾广铭.宁属及雷马屏峨边民教育的三大使命[J].边事研究,1938,06(06).
- [22]姚蒸民.如何经营新疆（续）[N].时事新报,1946-03-22(03).
- [23]曹为.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J].思想战线,2018,44(05).
- [24]边疆教育会议闭幕 孔副院长出席致训[N].时事新报,1944-01-16(02).
- [25]曹树勋.论边疆教育[J].中央边报,1946,05.
- [26]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省边地教育实施.成都: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1.

- [27]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M]//黄自进、潘光哲.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 第一册: 领袖的淬炼.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 [28]梁瓯第.贵州的苗民教育[J].边政公论,1944,03(02).
- [29]陈定闳.中国文化的危机[N].中央日报,1948-01-10(05).
- [30]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M].上海:中正书局,1945.
- [31]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J].边政公论,1947,06(03).
- [32]王柯.民族与国家: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33]姚蒸民.如何经营新疆 (续) [N].时事新报,1946-03-22(03).
- [34]胡耐安.从事边疆教育之一拟议[J].中山半月刊,1939,01(08).
- [35]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M].无,1947.
- [36]岑家梧.关于贵州民族之研究[N].前锋报,1948-11-02(02).
- [37]“西南民族问题的检讨” [N].东南日报,1940-06-20(01).
-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 2)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39]陈清宁.徭民的开化与动员问题.中山日报,1940-08-25(04).
- [40]张建中.中国近代边疆教育史论 (1901—1949) [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41]王一影.泛论边疆夷族青年的教育与训练[J].边政公论,1941,01(03/04).

On Intellectuals' Debates ov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rontier Education(1941 – 1948)

Shan Liyang

(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China)

Abstract: Between 1941 and 1948, with the rise of “frontier governance studies” (bianzheng xu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ngaged in extensive debates ov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rontier education. Most contemporaries agreed that frontier education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le acknowledging its distinctive circumstances and advocating ethnic integration 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minority cultures. At its core, this vision sought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tandard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frontier populations through education, thereby forging a mobilizable forc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However, this unifying orientation often carried strong Han-centric overtones, leading to assimilationist tendencies toward minority cultures. Some scholars reflected on the need to seek unity within diversity, aiming to build a “pluralistic yet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intellectual exchange reveals the deep tension between diversity and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the Republican era.

Keyword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rontier Educ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nd Nation-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